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二十八期（总第 278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07 年 6 月下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3905103528

编者按：6 月 23 日，市委、市府召开市区重点城建项目推进工作会议，动员和激励全市广大干群进一步振奋精神，团结拼博，加快市区重点城建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进中心城市做大做强。本刊在前面推出三期“城市建设”专题的基础上跟进服务，再推出一期“中心城市建设”专题，供领导决策时参考。

为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特征有更清晰的认识，我们推出“追赶”现代化先行的中国和“我们需要一种永远的危机感”两篇文章，相信会引发您阅读的兴趣。

要目

● 本期专题

中心城市建设

怎样的城市才是宜居城市

城市管理重在自治而非一味管制

创造“以人为本”的市政建设

不要让我们城市的传统毁于一旦

● 经济纵横

“追赶”现代化先行的中国

● 时评集萃

高法步：我们需要一种永远的危机感

● 本期专题

怎样的城市才是宜居城市

中国《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主要内容包括：社会文明、经济富裕、公共安全等六个方面。社会文明包括科学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

尽管有人批评中国《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有强烈的行政考核色彩，但其实这个标准的出台很有意义，这些标准虽然现在中国最好的城市也可能不会完全达到，但是有了目标就能够对相关部门起到指导和导向作用，特别是把民主决策和监督入宜居城市标准，其意义非同寻常。

民主决策和监督入宜居城市标准，首先表明城市是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市民的城市，市民有权决定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定位，是对执政方式转变的引导。城市究竟为谁而变？说到底，应当是为工作、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因此市民对政府决策应该是事先预知的，而不是由政府突然发布一个文件。例如有的城市公交车价格一下子上涨 50%，市民事先一无所知，这必然会给市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和不确定性。对居民来说，这个城市必然不是宜居的。

民主决策和监督入宜居城市标准，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市民公平享受资源权益。1996 年联合国人居议程明确提出了“宜居”的概念，倡导公平享受资源权益。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必然是科学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让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和监督，在政府部门、垄断企业与民众的利益博弈中，民众就能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因而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防止政府被垄断利益集团绑架；让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和监督，才能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防止政府权力被滥用。一个为利益集团所左右的城市，一个不断蚕食和侵犯个人权利的城市，一个在社会公共品不能平等惠及每个人的城市，对于那些利益集团来说或许是宜居的，但对于广大市民而言，必然不是宜居的。

民主决策和监督入宜居城市标准，更能保障政府决策的科学，避免决策失误和浪费。当前很多城市发展热衷于贪大求洋、追捧新奇，决策过程中领导的意志和审美取向强行介入，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遍地开花，高污染、高耗能的违规项目频频上马，不仅给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酿成无法估测的损失，也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显然这样的城市规划建设背离了基本目的，成为决策者展示政绩的舞台。而让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和监督，政府

决策就会更为科学，就更能避免决策失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与浪费，在规划上也更为注重维护民众利益。（《区域综合开发》总第 96 期）

城市管理重在自治而非一味管制

城管每次在街头出现，就搅得鸡飞狗跳。但城管真的撒手不管，街头又会被小商贩挤占，让人寸步难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走出两难，既保障小商贩自雇经营的权利，又保障行人自由通行的权利呢？

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北京革新西里居委会主任夏素明实验的模式——居委会出面与小商贩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小商贩自主经营，但必须严格自律，不影响社区秩序。实验的效果很好，小商贩和社区居民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这个模式姑不论是否值得推广，至少可以在革新西里坚持下去吧？但是不行，夏素明的实验最终还是夭折了。

商贩自治何以难于推行？显而易见，不是社区居民天生喜欢管制，不愿自治；也不是他们素质不高，不具备自治能力；商贩自治的障碍不在社区内部，而主要来自社区之外——城管部门不答应。

本来，社区是否可以摆摊属于民事范畴，可以让社区居民自我调整。明明是社区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非要纳入城管部门管制的范围不可。而一旦成了城管部门的一亩三分地，你要再拿回来，城管部门自然不答应——全国城管人员的总数，怎么着也有好几十万吧。这好几十万人也要吃饭，也要穿衣呀。社区都自治了，不再需要城管了，这几十万人怎么办？难不成喝西北风去？

同样的逻辑，在燃油税问题上也显得非常突出。燃油税制度好不好？当然好得很，既公平，又合理。但这么好的一个制度，就是干打雷不下雨。

这里面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主管部门已经坦率承认的，假如用燃油税制度取代养路费制度，30 万收费人员将何去何从？

为了不让城管人员闲着，社区只好出让自治的权利；为了不让收费人员闲着，纳税人只好出让公平税负的权利。按理说，公共部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某些部门之所以必须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们能提供什么服务。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管制?奥妙就在这里。某些部门依赖管制而生存,人为制造管制需求、放大管制需求,就成了他们的职业本能。瘾君子断了鸦片就会跟你要死要活,于是你只好继续为他无偿供给鸦片;某些部门离开了管制就无事可做,于是我们只好用我们的权利为他们埋单。

为管制而管制,依赖管制而生存的部门,仿佛一个又一个的黑洞。它们不创造任何财富,反而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巨量的社会财富。这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根据专家的保守估计,企业负担的 1/3,特别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负担的一半来自于非税收入。仅在 2006 年,全国非税收入就可能达到 13000 亿。如果 2 万元非税收入解决一个劳动力就业,则被非税收入扼杀的就业机会为 6500 万个。

自治为什么是一种最好的秩序?且不谈自治的社会学意义,单就经济学角度而言,自治也是一个最划算的选择。如果商贩自治得以全面推行,我们就可以少供养几十万城管人员;

如果行业自治得以全面推行,相关职能部门的精简就不会是一个问题。如此,过高的行政成本就不难降下来,大大减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负担。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显然将给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创业空间。管制当然不可能一概取消,但毫无疑问,凡是人民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公权力就不应该进入,就应该让人民自我管理,这样才会使社会管理成本最小化,社会才会轻装前进。

公共部门本质上属于服务业,只不过它提供的不是普通的服务,而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但服务业的总规律,即市场规律,对它仍然起作用。哪个部门不为公众所需,或总是质次价高乃至货不对板,它就应该被公众淘汰,就应该关门走人。总之,公共部门只是满足特定社会需求的工具。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公共部门独立化,以致它的生存本身成了目的。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废物”的主要症状,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危险趋向。(《区域综合开发》总第 97 期)

创造“以人为本”的市政建设

经济的发展,使有些地方有了些钱,就不断地重铺城市的人行道,是许多城市的通病。近十年来,北京将人行道路面反复翻铺至少有三次。记得以前路面不少是传统方砖,后来改铺水泥方砖。到 1999 年时,北京街头铺上了高级、“现代化”的彩色釉面地砖。

市民不知道这次铺入行道地砖花了多少钱，但有一点是知道的，城市虽然“光亮、高档”了，但这种追求高档现代用错了地方，彩色釉面砖放到大街人行道上，把行人害苦了。这种由于这种砖使路面不渗水，所有雨水都要流到街道上再下到下水道。所以，北京一旦下大一点的雨就出现马路变成河的局面。

当那些市政管理官员们明白好看的地砖不但不实用，而且有害时，又开始新一轮的换地面砖。这次换地面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铺的路面砖因很多施工质量差，铺了不久就凹凸不平。

也因那种砖受力面大易压碎，有的铺了两三年就烂了。

现在，釉面地砖又换成传统的方泥砖。这本来是最好的铺路面材料，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种砖砌路面，西方国家的那些老城市街道和古老的小镇，也能看到这种土砖。

它不但便宜，而且走起路来实在，不会打滑，而且吸水性强，地又不坚硬，即使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怎么伤人。铺什么地面砖这个简单而浅显的道理，老百姓都知道，为什么城市这让人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施工者非把盲道有意放在障碍重重的地方？有人曾向施工者提醒过不能这样处理盲道，可施工者说，就是这么设计的。这不能怪施工者，是建设管理者的责任，他们为什么不到施工现场看一看呢？

以上这些似乎是些零散的事，但绝不是没有联系的。

它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我国一些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突出问题：管理能力差，责任心欠缺，特别是城市管理理念上有问题，盲目追求奢华，不是真正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如果一个城市建设者缺少文化，而又迷恋奢华，又不负责任的时候，就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我们是否应该反思：高档昂贵的并不一定就是好的；现代时髦的并不一定是有用的；花了钱的不一定是人民满意的。

近些年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和现代化，在城市改造中，从反复拆铺人行道，到滥拆城市、破坏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古迹，滥修豪华大广场，盖办公楼。本来城市发展改造是好事，但许多城市建设干了很多愚蠢的事，引起市民许多的不满。这是为什么？最关键的是城市建设缺少人文关怀，不是真正以人为本，而是“目中无人”。

我们过去缺少关怀弱者的意识，城市没有盲道，没有无障碍设置。现在政府强调体现人文关怀，要设盲道，搞无障碍设施。但是由于一些管理者缺乏这种意识，做起来只能是应付了事。很多盲道常常放在最不好的位置，障碍重重。像亚运村新铺路上的这条盲道简直可以

说是一条给盲人设陷阱之路。

盲人依此走下去不是可能碰个鼻青脸肿，就可能绊个大马趴。

如果城市建设者没有人文关怀，城市将是很残酷、无情的，为了路而修路，而不管行人是否方便行走；为了商场而建商场，而不管人是否方便到达；为了车站而建车站，不管交通是否连接。这就是我们很多城市的状况，很多街道被隔离起来，马路对面近在咫尺，人却难以通行。

很多行人道被车道挤占了，火车站和大型商场甚至不让出租车和其他车辆停泊，但是又不建停车场。很多地铁和汽车站之间相距遥远，机场、火车站和汽车总站不相互连接，而且常常是东西南北，难以转达。这些城市设施都不是以人为中心建设的，所以，人行起来极不方便。

城市建设真正以人为本，就必须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安全、方便、快捷、舒适。如果城市管理者不以人为中心，他们可以在一两件事上会做好，或慢慢领悟过来，像铺路砖那样。但不会把其他事都做好，像铺盲道和后面说的许多那样的事。他能做一，就不一定能做二三，因为人并不总在他心中，他不会把人贯穿在城市建设的始终。

有些城市管理者为何会犯一些如此低级的错误？除了有管理能力和责任心，也还有做事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才，城市管理者也不可能是。这些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管理者要知道虽然你有权力决定城市的政策，但不要认为在城市可以随意涂抹，随意拆建。而应该尊重居住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做什么事多听听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参与各种事务。这样才不会犯那些愚蠢错误，才不会把人放到最不重要的地方，才不会在他们行走的道路上制造障碍和危险。

不要让我们城市的传统毁于一旦

回顾近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方面流于简单地向西方学习，建设高楼大厦。现在看起来都存在“误读”。城市的建设应该根据各地情况采取不同思路。有悠久文明历史的西欧，根本不是当年我们从电视图像上看到的那种高楼林立的“现代化”。但是，发现这一点时已经有点晚了。现在我国不少城市都是“崭新”的，大部分都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别说和欧洲比，就是和“没有历史”的美国比也要短得多。

这种现象和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处于落后形成的追赶心态有关。很多人希望城市从外观上向发达国家靠近。很多旧城拆迁中，地方决策层都认为“太落后了”、“太破旧了”，非拆不可。

实际上，中国有非常优秀的城市化传统。和西方不同，中国从唐朝开始就出现很多城市。由于社会具有成熟的宗族礼法格局，到明代形成了无城乡建筑差别的城市。在皖南的山区里，现在可以看到遗存下来的非常成熟、优美、先进的古代建筑。把苏州切一块放到皖南山区的农村，或是把皖南农村的一部分放大挪到苏州，几乎是一样的。

从秦汉时人们开始用夯土技术造房子，在杭州这座南方富庶大城，至今可以看到那么多的“土房子”，显示出秦汉建筑脉络的延续，这是很重要的“城市记忆”。看起来土得掉渣的夯土技术，其实是高度理性的产物。“百年的砖千年的土”。中国古代造房子，很注重稳固和长久。

中国本土的建筑传统是一个循环营造的体系，有很多奇妙的细节，为现代建筑技术所不及。如传统的中国建筑方式是没有下水道的，主要用地渗技术，从地表大范围地向地下渗透排水，效果很好。而现在的下水道技术，只要有一个地方堵了，其他地方就都要积水。很多抛弃传统简单采用西方技术的建筑方式都是这样，花了大价钱，却制造出新的问题。

举这些例子并不是简单地提倡复古，而是想说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存在的很多“闪光点”，但是目前处于不被人重视的境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传统的营造体系受到破坏，除了在最不讲究建筑文化的地方——农村里尚有遗存，在城市中大都已经中断了。

城市之魅力，不是来自于大楼有多高，马路有多宽，而是来自于文化的独特性。竞争力就来自于创造这种有差异性的文化的能力。

在很多城市，一些街道原本拥有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各种痕迹，都有其独特的城市记忆，层次分明，形成历史线索的会合，不应该在一次次旧城改造中被全面“覆盖”更新。

尤其不能简单地用“有没有住过名人”、“有没有发生过著名事件”作拆除与否的依据。前几年发生的拆除中国美术馆后一个四合院的事件，当时的说法就是“不是文物，也不是名人故居，也不是著名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种思路左右了我们城市保护工作很长一段时期。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中国建筑文明并不是个别名人和历史事件构成的，普遍意义上的大众生活才构成文化的根基，很多路边的小东西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痕迹，但人们都把它们忽略了。

中国要变成有文化魅力的创新型国家，需要的动力就包括历史文化的记忆，这是产生自主创新灵感的土壤。而城市的文化价值不是简单的“先进”、“落后”之比较，而应该是“文

化之差异”，从这个角度讲，面对越来越迅猛的城市化热潮，保卫我们城市的传统，已经到了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的地步了。

中国曾经有很优秀的建筑营造传统，古代的中国，造房子应该是每一个男人都会干的事情，历史上很多艺术家和建筑师是一身兼具的。今天，被不少人视为没有技术能力的农民工，其实都是“砌石头”这一传统营造工艺的大师。现在这种古代流传的工艺只有在农村还有保留，这些农民工砌出来的一小段石墙，放在美国都可以称得上是文化遗产。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在建设中大量启用传统的手工建造活动，从很多工地回收了 600 万片旧砖瓦用于校区建设，还大规模启用传统的手工建筑方式，让农民工展现“砌石头”的精湛手艺，使营造传统有传承下去的可能。全球最著名的美术学院美国罗德岛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看到象山校区的建筑，感到非常激动，认为从这样的建筑工艺中看到的是真正的“中国味道”。

旧城改造能否交由居民主导

为什么旧城改造只能由开发商来做，为什么旧城改造就意味着大拆大建？作为旧城的居民他们深爱着老房子，如果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建设、呵护好自己的家园，那么能不能把旧城改造的主导权还给这些居民自己？

以东四八条胡同为例，对于部分待拆迁房屋是否有保护价值，北京市东城区和市文物局各有说法。不过，不管最终结论如何，当地许多居民都不想离开自己的房子，目前已有一位居民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拆迁许可证，她表示，完全可以自己翻新自己，而且不会破坏房屋的原貌，没必要非把房子卖给开发商。此前一位居民表示，“既然是文化保护区，就不能随意拆除，北京剩下的老房子不多了，只要明确说不拆，所有的住户都会把房子修得很漂亮”

一直以来，北京乃至全国城市的危改和旧城改造，基本都遵循“政府+开发商”的模式，但这位居民的话启示我们：为什么旧城改造就一定要大拆大建？作为旧城的居民，他们深爱着老房子，如果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建设、呵护好自己的家园，有信心将自己的房屋修得很漂亮，那么能否把旧城改造的主导权还给这些居民呢？

改造旧城，大片地拆毁重建，这样的模式让传统的北京日渐萎缩，让有着悠久历史的街区一个个地消失，代之以一些平庸的伪古董，给北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教训。

其实在国外城市，对保存较完好，有着大量历史文化沉淀旧城区的改造，往往是精雕细

凿，分散由一户户的居民来进行，很少有大规模拆建。这固然有公民私产受到严格保护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在于，在这些城市的意识里，旧城建筑负载和传承着历史文化的种种变迁。是城市的宝贵记忆，它使城市与古老文明之间有了一个绳结，让城市在飞速的现代化进程中，能保留一份安谧与深沉。国外的经验，应该是我国特别是北京文保区这样的旧城改造应该借鉴的。文保区是集建筑、文物、人文于一身的大型博物馆，对它的改造更新，犹如整理一个摆满瓷器的货架，显然应该小心翼翼。像东四八条这样区域，属于北京古民居建筑中的精华部分，建筑质量总体较高，其中危房只占很小一部分，它们不应被拆除，而是应该一个个加以修缮，拆除各类违章建筑，这些工作只要政府给予居民以规范、指导和支持，就可以完成。

“政府+居民”的旧城改造模式若能形成，将是一场城市建设的革命。在“政府+开发商”的模式中，居民对旧城区拆与不拆充满疑问，自己的房屋即使再脏再乱不堪，也不愿修缮；在“政府+居民”的模式中，这种疑问也许不再存在，因为居民房屋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政府+开发商”的模式中，当地居民很难参与其中，旧城改造很容易成为“建设性破坏”；而在“政府+居民”的模式中，蕴藏在民众中的激情和活力得到释放，旧城区得以自然生长，获得新生。在“政府+开发商”的模式中，旧城改造常驻常伴随着冲突与对抗，付出的代价昂贵；而在“政府+居民”的模式中，合作、互信代替了对抗，政府?居民齐心协力，使旧城区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意义上，都是城市的一笔巨大财富。

这居民参与下的旧城改造，没有了“惊心动魄”的城市规划大手笔，以及“改天换地”城市形象冲击，取而代之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城市悄悄地改变，健康地成长，一步步接近宜居、人文、和谐目标。

● 经济纵横

“追赶”现代化先行的中国

后发性经济

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先后出现三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范例：第一次是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美国经济起飞花了 43 年时间追上英国。第二次是二战之后日本经济起飞，花了 40 年的时间追上美国。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它创造了从

1820 年到 1992 年期间人均收入提高了 28 倍的世界记录(年平均增长率 1.95%)；第三次是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 30 年时间追赶西欧国家。

因此，国家从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进国，先进国和落后国，追赶者和落伍者；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可以分为创新者和追赶者，主导者和模仿者。所谓后进国是指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国家。按照格申克龙所说，后进国与其说是在某一点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发动工业化和进入工业化时这一问题上，发动(进入)时间相对滞后的国家。中国属于现代化的后进国，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称为后发性经济。

转型中的经济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涉及 29 个国家近 16.5 亿人口，是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目前以及相当长时期也都处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变革对经济学提出了重大挑战。

当前，集中体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转型实践中已经遭到失败，而根本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标准处方的中国改革却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还只是初步建立。

在比较长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行政管理、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关键性领域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需要突破；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露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而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取得的某些积极社会经济成果却在体制转轨中有所流失。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任务还没有完成。还要看到，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是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才达到现在的成熟完备的水平。所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完善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时，既不能悲观失望，也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的推进。

成长中的经济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追求像发达经济体那样的的平稳增长，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理想目标。然而，当今世界上的后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却呈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成长中的经济，一种是停滞中的经济。

成长中的经济，从近期看，都是问题成堆的，比如说，工人下岗、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生产安全事故不断等。但是每隔 5 年或 10 年回头一看，就能看出经济的巨大变化。停滞中的

经济，从近期看，好像问题并不突出，隔了10年回头去看，发现变化不大，这种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几几乎是停滞的。（《领导决策参考》2007年第20期）

● 时评集萃

高法步：我们需要一种永远的危机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保持了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这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是中国近一两百年来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段。

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全国上下蔓延着一种极其乐观而近乎浮躁的心理。经济学家们通过审慎的研究和精密的计算，提出中国经济还能持续增长20—30年的预测。这的确令人振奋：根据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前后加起来50—60年的持续增长。“赶日超美”根本不在话下。

这种经济浮躁还反映为文化浮躁：跟在经济学家后面的是历史学家，他们不甘寂寞，大谈“汉唐盛世”；影视界则锦上添花，迅速推出一批“盛世”作品；更有甚者，还利用古玩热来反证“盛世”的到来——“盛世收藏”嘛！而文化浮躁的极端事例，则是“国学热”演化成的“复古之风”，如“汉服热”、“唐装热”，《三字经》和《孝经》入课堂等。可见，目前的浮躁情绪不只是个别的，而是全面的。

事实上，历史上的全民浮躁没有一次不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远的不说。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将近10年的高度繁荣。这种持续繁荣冲昏了美国人的头脑，社会上流行着“美国永久繁荣”的神话。然而，没过多久，美国经济就陷入30年代大危机之中。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70年代末，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时，日本的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在欧美市场上所向无敌。日本人在美国购买了大量地产和股票，甚至狂妄地说要“买下美国”。然而，没有过多久，泡沫破灭了，日本陷入长达十几年的停滞。

20世纪50年代，我国取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然而在随后的大跃进中。全民的浮躁导致全民的浮夸，而全民的浮夸进一步导致全民的浮躁。这一系列

历史教训是我们必须吸取的。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其崛起、发展到鼎盛的历史过程中，一方面要有不断的危机意识，所谓居安思危，居危思危；另一方面，要有不断的自我批判精神，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旺盛的和永不枯竭的创造力。而任何浮躁浮夸、自足自满、故步自封，都是历史的羁绊。

我国历史上的确经历了不少的盛世，这些都是可以引以为豪的。事实上，我国的盛世之议古而有之，但“盛世危言”也史不绝书，历朝历代都出现过所谓“自古有国有家，鲜不极盛而衰”的警告。所以，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绝不轻言“盛世”的到来。

客观地讲，我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迅速崛起，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可以使我们增强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信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真正的作为大国崛起和民族的真正复兴，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如果总是沉湎于“盛世”的追忆或“盛世”的幻觉中，那就不是一种健康的民族心态。而在这种关键的历史时期大谈“盛世”，除了能造成一种“盛世泡沫”外别无益处。（选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7第20期）